建道學刊 25 (2006): 143-158

中國的新形勢與中國事工的新定位[1]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全面改革開放的年代

中國過去三十年推行的經濟和社會改革，取得了驚人成就，有說這是二十世紀最成功的經濟改革模式。[2] 社會急遽轉變，人民生活也大有改善。當然，人口眾多、資源（包括能源、食水）匱乏，中國老大難的問題仍多；而改革開放也催生了許多新的問題，諸如法制的訂定和執行、環保、社保、地方／區域主義等。中國面對的問題沒完沒了，就像

[1] 本文是一篇講稿，發表於香港房角石協會十周年紀念研討會（2005年10月29日）。

[2] 世界銀行的高級副總裁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認為這是二十世紀全球最成功的經濟改革方案，就是緩進式的，「摸著石頭過河」。"WB Chief Economist Praises China'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ttp://english1.peopledaily.com.cn/features/economy/072501.html>（2005年10月25日下載）。

黃河的水無法變得清澈一樣。俟黃河清，人壽幾何？不過，要是我們並非專注挖掘問題，當可看到現在於許多方面(包括尚未全面改革的政治上)都較過去有長足進步，憶苦思甜。今天是最沒理由持悲觀主義觀點的時間；而我們必須注意，任何過分悲觀的預測，都是跟國內多數民眾的想法脫節的。

改革的步伐不斷加快，開放的幅度也與日俱增。中國共產黨剛召開十六屆五中全會，會議主題是在經濟建設的同時，致力建立一個均衡和諧的社會。中國已逐漸擺脫經濟掛帥的單一路線，朝向全方位的改革發展。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指出，中國將進入全面崛起的新時代，這包括全面建設、全面改革、全面創新和全面開放。

所謂全面建設，就是建設十三億人民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和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不僅加快沿海地區的發展，而且向中西部地區提供幫助；不僅使已經富裕起來的人民更加富裕，而且使沒有富裕起來的人民盡快富裕起來，使所有貧困人口徹底擺脫和告別貧困。

所謂全面改革，就是全面消除各種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從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從國有企業、銀行改革到政府改革，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所謂全面創新，包括制度創新、市場創新、技術創新和觀念創新。

所謂全面開放，就是要建立全面開放的經濟、全面開放的市場、全面開放的社會和全面開放的文化。[3]

以上都是宏願，能否完全實現尚得拭目以待，但我們沒理由認為這僅是政治空口號，而非國家領導人志切實現的目標。事實上，政府、學

---

[3]〈胡鞍鋼：中國全面崛起〉，〈http://hk.news.yahoo.com/051012/12/1hkre.html〉(2005年10月14日下載)。

者和傳媒都看到，地域差距與貧富懸殊，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落差，都是必待解決的問題，他們如今便著手應付這些問題。

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裡，再沒像過去般提到「效率優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認為，政府正在改變此前長期推行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轉而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則，以縮小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緩和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激化的局面。他指出，中國當前所處的既是戰略機遇時期，亦是矛盾突現時期，2000年全國共發生群體性事件一萬起左右，2004年已增至七萬餘起；而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二〇〇五年社會藍皮書報告》，1993年至2003年，中國的群體性事件的參與人數由約73萬增至307萬。這是由於政府無法滿足困難群體的公共需求，沒有為老百姓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而機會不平等又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4]

學者甘陽指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核心問題是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而二十一世紀則是建立一個文明國家。[5] 在鄧小平時代，這個政權的合法性主要建基於經濟建設之上，要帶領國家走出一窮二白的困厄，「四個現代化」是政府與人民的共同關懷。但在未來半個世紀，政府得提出一個更清晰的治國藍圖，即如何帶引國家步入富強，並創建一個平等、公義、和平及友愛的社會，像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裡所說的，建構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中包括以下要素：「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公報指出，要按照這一要求，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這三個「最」都說明疏導民怨、體察民情和紓解民困為當前的要務。

---

[4] 〈中國政府更加著眼公平〉，《大公報》，2005年10月25日，頁A15。

[5] 甘陽：〈從「民族國家」走向「文明國家」〉，21世紀經濟報道編：《中國世紀——新的開始和機遇》（香港：牛津出版社，2004），頁3。

這裡筆者不擬對中國的前景作任何分析和預測，只欲強調，改革的勢頭仍然強勁，未來的中國充滿變數。

海外人士談論中國時，總不免陷入過度樂觀或過度悲觀的兩極裡。過度樂觀的人注目於中國發展的積極因素，譬如上海與沿海城市的快速現代化，然後便論說二十一世紀是屬於中國的，中國將很快取代美國而成為全球的新霸主，或至少取代日本而在亞洲佔據鰲頭；過度悲觀的人總是針對當前的這種那種問題，指出這些問題都不可能在短時間獲得解決，所以社會必有動亂，國家必然崩解。自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不少海外觀察家都預測中國在甚麼時候會產生動亂，強調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配合必走不下去，但迄今這些預言仍告落空。中國的改革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政治改革也必須列入議事日程，但這顯然不是為了避免很快亡國的圖存之舉。[6]

二、社會激烈轉變

中國有待處理的問題繁多，每個都棘手非常。

以我們這幾年很關注的農民問題為例。「三農」問題是當前的社會焦點。 2000 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中說了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三句話觸動了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心，他動情地覆批李昌平，並以此三句話作為「三農」問題的概括。[7] 農民生活的改善，農村與城市差距

---

[6] 不少學者爭論中國會否、又在何時實現政治的民主。悲觀主義者認為，只要共產政權存在一天，民主的春天都不會到來。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個看法。參 "Can China change?: Other Chinese societies have done. But, unlike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y did not have the Communist Party to hold them back," *The Economist* (2 October 1999), 〈http://www.econ.umn.edu/~rauer/china1.htm〉（2005 年 10 月 25 日下載）。

[7]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頁 3 。

的縮窄，農業如何保持競爭力，都是嚴峻的問題。不過，我們常常把「三農」問題簡化，僅視為中央政府維持一貫的犧牲農業成全工業、犧牲農村成全城市的傾斜政策，或地方政府貪污腐敗、官僚隊伍無限制膨脹、對農民徵取苛捐雜稅等錯誤施政所導致的結果。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消除這些因素也刻不容緩；但不等於只要這些因素除掉，「三農」問題便迎刃而解。農業問題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亞洲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問題，是全球化與美國壓迫下所造成的問題。

說個不是題外話，世貿去年底在香港舉行，約一千個韓國農民前來參與示威活動。根據我們一貫的印象，韓國農民都是激進暴力的一群，2003年9月10日墨西哥坎昆世貿會議的會場外，一位韓國農民李耿海便以自殺形式，控訴「世貿謀殺農民」。[8]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他們的訴求，譬如他們這次發表了一封給香港市民的公開信，信中指出：

> 自從1994年世貿烏拉圭回合談判，大量進口農產品的流入，令到我們國內農產品的生產嚴重下滑。而農民的收入與農產品產量一同直線下降，農民傳統的生活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因此，韓國青年不斷離開農村，現在已再沒有人留下去保存韓國的務農傳統。
>
> 自從世貿於1995年成立，韓國農民的人口下降了一半，總體農民的負債上升了四倍，而韓國農民的平均年齡高達六十歲。
>
> 韓國農業已面臨崩潰。這猶如將農業及農民的傳統生活判處死刑。

---

[8]〈世貿坎昆會議上自殺韓國農民血淚史〉，〈http://news.big5.enorth.com.cn/system/2003/09/18/000635301.shtml〉（2005年10月25日下載）。

現時，韓國四分之三的農民種植大米為生。大米種植對於維持我們的農業收入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因為入口大米而令大米種植消失，是對農民生計一個關鍵打擊。韓國農民明白到一旦完全開放大米市場，維持傳統農民生活方式的機會將會消失。[9]

這個宣言對我觸動甚深，故大段徵引如上。我難以自禁地聯想到，韓國農業的現實，也是中國將來的困局。

從農業人口比例和農業所佔的總生產值比例言，中國是農業大國；但從農業生產成本與外銷競爭能力說，中國與美國、澳洲等地廣物饒的國家，仍有懸殊差距，後者才是名副其實的農業大國。社會結構不平衡、貪污腐敗，都是必須處理的問題，但這些因素解決了，「三農」還是有待應對的問題。可以相信，只要中國持續開放，將來必愈來愈受制於世貿規定，而被迫大量進口糧食，農業問題便愈來愈不易處理。

除農民外，民工也是一個急待處理的問題。民工是國內大規模移民潮的產物，他們的遷移在富裕地區製造了一個賤民階層。民工不僅貧困，更在城市現有政策下遭受嚴重的差別待遇，缺乏社會各種保障，連子女就地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亦闕如。不過，據北京統計局透露，中國將於 2006 年下半年開始實施新的失業率統計方法，民工階層將首次納入統計範圍，這或意味億萬民工將得以納入失業保險體系，如此肯定是解決城鄉二元分割的重要一步。[10] 我們明白要徹底廢除戶籍制度，容許人民自由遷徙，中國得承受極大的社會和經濟風險，如上海般富裕城市或會陡增數倍人口，目下才逐漸建立的社保制度亦將無法負荷。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政府都是採取暫時犧牲平等以換取經濟發展空間的策略，即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策略是不理想的，對遭受

---

[9] 韓國農民聯盟、韓國婦女農民協會：〈韓國農民致香港市民書〉，《思》第96期（2005年9月），〈http://www.hkci.org.hk/Reflection/No.96/sze_96.htm〉（2005年10月25日下載）。

[10] 〈億萬民工將納入社保體系〉，《大公報》，2005 年 10 月 25 日，頁 A15 。

差別待遇的弱勢群體亦不公平，但這卻是現實中唯一可行的策略。直到如今，中國還是理想主義不起來。

發展與平等不總是此消彼長的，政府也不能只顧發展而忽略平等，否則將要付上沈重的社會代價。但我們亦得看到，當前存在的各種差異，特別是城鄉差異、地域差異，不純粹由政府政策造成，自然條件的差異才是更關鍵的元素。所以，政府所要做的不僅是修改差等待遇的不公平政策，更要制訂傾斜機制以調整自然差異，讓條件較差的地區和個人有較公平的發展空間。這除了關涉到政策的調整外，政府可運用的資源和管治能力也是必要的考慮。單就後者而言，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和社會結構經歷了劇烈的變化，政治控制社會的程度減少，社會異質性增加，不同地域、行業與個人的利益分化，擴大了社會的不平等，政府對社會的管治能力也被削弱。

筆者無意以一篇短文來概括中國當前得處理的所有問題，只欲指出，所有有待解決的問題都是既深且重，無法一朝解決的；但要是中國能闖過國營企業改革這個極大的難關，上述的難題便能一步步的尋求解決。我們不輕看問題的複雜性，但也不把問題誇大至水深火熱的程度。海外人士得提防這樣的心理蔽障：為了擺平心中對中國崛起的抗拒與恐懼，而故意誇大她存在的問題。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 2005 年 10 月 24 日訪華前稱，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變化巨大，世界必須適應中國的增長；同時，中國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以便在世界發揮更重要的作用。[11]

對香港以至海外的華人教會而言，我們對中國崛起的適應仍未足夠。

---

[11]〈世界須適應中國的增長〉，《大公報》，2005 年 10 月 24 日，頁 A4。

三、教會的脱軌與追趕

以下轉到對教會的討論。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政府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所有宗教進行嚴酷的整治，造成宗教團體和活動在頗長時間內大幅萎縮，亦使宗教被拒於主流社會和文化外。「文革」及其後共十餘年間 (1966~1979)，宗教更被視為非法。不過，在嚴冬期的末段，隨著全能主義政治和政社一元化的總體性組織愈來愈僵化，政策上的倒行逆施動搖了人民對政權和官方意識形態的信仰，小部分處於較近社會邊緣位置的人（農民、婦女），冒著犯法風險而偷偷信奉基督教，雖然為數不多，卻成了福音的餘種。「文革」結束後，「四人幫」政治黑幕揭發，社會廣泛存在「三信危機」；配合 1979 年以後宗教政策略為開放，促成了基督教大復興的黃金十年，可說是物極必反。八十年代是基督教在中國發展最高速的時期，信徒人數有百倍的增長（估計由 1979 年的不到十萬人，增至 1990 年的二千萬人以上）。九十年代中葉以後轉趨平穩。

基督教在國內已合法傳播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在部分地區更有可觀的增長，但她仍未突破社會和文化的邊緣位置。信徒「三多」（農民多，婦女多，老人多）或「四多」（除三多外，另加教育水平低者多）的普遍現象，充分說明基督教給邊緣化；筆者曾指出，九十年代初少數對基督教具好感的知識分子拒絕加入教會，另起爐灶而自稱為「文化基督徒」，亦間接反映出基督教的邊緣化。[12] 基督教雖然獲得有限度合法存在的地位，卻未曾享有自主自由發展的政治空間，黨政機關的監控依然嚴密。[13] 而在民間，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壟斷了教育、文化領域和

---

[12]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頁 57、430。

[13] 民族和宗教是中共監控得最為嚴密的兩個社會環節，這也是江澤民所說「民族宗教無小事」的意思。在國內各種合法宗教裡，天主教和基督教是最受嚴密控制的。不過，近數年伊斯蘭教也開始受到較大的關注。有關討論，參梁家麟：〈宗教工具論——中共對宗教的理解與利用〉，《建道學刊》第 22 期（2004 年 7 月）。

各種媒體（互聯網是例外），加上社會上仍流傳著相當的偏見歧視，基督教的邊緣性更為顯著，文化界出現的所謂「基督教文化熱」，並未改變基督教廣泛遭歧視的事實。時至今日，基督徒被迫害的案例也間有發生，被歧視則俯拾皆是。

這樣的情況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有若干改善。一方面，浙江溫州和上海等城市冒起了一群從事工商業的基督徒，他們有較佳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可以利用人力和財力資源推動植堂佈道事工，甚至延伸到全國以至國外。二方面，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陸續有不少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信教，他們自組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家庭教會和教會網絡，配合在海外歸信基督的海歸派信徒，成了中國教會一股新生力量，有極少數甚至意圖以基督信仰精神來從事社會和文化改革。[14] 三方面，海外若干宣教組織在國內積極推動學生福音工作，取得可喜的成果，並與歐美各地教會採取針對留學生的佈道策略互相呼應。十餘年間，上述三方面的努力已逐漸產生效果，第二和第三方面更有合流趨勢，匯聚成知識分子歸主的運動。

但直到今天，我們仍未能說這三方面的努力已改變中國教會的整體面貌，扭轉「三多」或「四多」的情況。商人和知識分子基督徒集中在大城市裡，實際人數和所佔比例都不高。中國教會的信徒仍以在農村的居多，[15] 而即使是城市教會裡，也還是有婦女多、老人多、教育水平低多的特徵，且以三自教會最為顯著。所以，基督教在社會與文化各領域的邊緣化情況，仍有待進一步改善，有待國內外的基督徒共同努力。

---

[14] 梁家麟：〈自由主義與基督信仰：九十年代知識分子余杰述介〉，《建道學刊》第24期（2005年7月）。

[15] 筆者在數年前撰寫《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時，曾估計農村信徒佔全國信徒的八成以上。近年由於眾多年輕的農村信徒進城當民工，好些地區的農村教會有萎縮危機，如今我們可以估計農村信徒約佔七成左右。

至於教會的實際情況，毋庸爭議的是，無論是三自教會抑或家庭教會，都有愈來愈分化的趨勢。三自教會方面，九十年代以前，以丁光訓為首的全國領導層，曾銳意使組織教會化，積極推動教會事工，取得令人讚譽的成就；其後因形勢變化和個人的特別企圖，在全國層面，三自會愈來愈政治化，政策僵化，人才凋零，與福音使命和信徒需要脫節。省級以下則呈個別發展，有努力開展佈道與牧養的，亦有專事監管卡壓信徒的，端視牧者與領袖的信仰素質而定。教會的增長幅度與其政治化的程度成反比。譬如說，杭州建成全球最大的華人教堂，東北某些地區的教會有巨幅增長；與此同時，若干城市的三自教會變成老人活動中心，信徒增長停滯不前。較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受高層政治化的拖累，多數神學院的發展都欠理想，四分一個世紀下來，仍未累積到第二或第三梯隊的神學教育與研究人才，畢業生的損折率也甚高（有說超逾一半）。

家庭教會方面，過去曾有四大系統或五大系統的說法。這除了和個別的魅力領袖有關外，亦與海外資源的代理和分配系統分不開，培訓系統與神學傳統倒是較次要的元素。隨著海外不同教會和機構的參與渠道日多，部分國內領袖移居海外而逐漸失去影響力，過去較清晰的系統已給擾亂，群龍無首，誰也不服誰，自立門戶者眾，自行攀附組合的情況也甚普遍。所以如今已不容易在組織上為家庭教會歸類。

不過，我們倒仍有兩個簡單的歸類方法。其一是利用類型歸類，將家庭教會分成北京、溫州與河南三大類別。北京類別（上海屬同類）是知識程度較高的城市家庭教會，溫州類別（閩南與廣東潮汕地區的城市屬同類）是信徒人口較集密、教育程度中等、經濟實力較強的城市家庭教會，而河南（安徽等屬同類）則代表貧困與教育水平低、信仰較接近民間宗教的農村教會。

另一個則是以家庭教會對政府的態度來分類，包括：堅決走屬靈與屬世對立的出世路線的，跟政府和三自教會和而不同的，以及積極尋求

合法登記爭取信徒的合法權益的。[16] 其實，這也是家庭教會間屬靈觀和神學路線的分歧，是世界觀和社會觀的差異，可以追溯到西方的敬虔主義(Pietism) 與清教徒主義 (Puritanism)，以及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的生命派與基要派之爭。筆者相信，要是政府在家庭教會登記問題上採取寬鬆的政策，是否願意登記，勢將成為家庭教會主要的分化和分類點。

家庭教會派系林立，群雄逐鹿。但分久必合，我們間中仍可看到一些「合流」現象，譬如部分家庭教會領袖訂定信仰與使命的聯合宣言，甚或尋求某種形式的結盟。筆者最近聽到的消息是，一些河南的農村教會尋求與北京的知識分子教會合作，爭取後者的信仰認可和指導。所有合一運動都是可喜的現象，但筆者擔心這不過是縱橫捭闔的政治行為，藉結盟而爭取成為「正統」，並非在信仰上尋求合一。現實地預測，在較具名望的老一輩牧者相繼逝世以後，家庭教會的派系只會增加，不能減少，這是中國教會缺乏宗派規範而衍生的一個弊端。

筆者曾指出，八十年代中國教會復興，與五十年代受苦信徒的連繫甚為薄弱，我們其實可視 1979 年後的一頁為基督教在華的第五度傳播。絕大多數較具影響力的家庭教會領袖都是在「文革」後才信主的，而帶領他們信主的前輩信徒，如李某等，在五十年代多數沒有甚麼影響力或作用。長期坐牢仍幸存的幾位前輩，如王明道等，他們在獲釋後也沒有太大作為；即使仍有在城市主領教會，直接跟隨者也不多，最大如林某的教會，信徒亦不過千人，與農村上萬信徒的系統不可同日而語。尤具諷刺的是，九十年代被海外機構捧為家庭教會代表的前輩，諸如邊某與謝某，在五十年代以前根本無大建樹，八十年代教會重開後的參與也甚少，最大貢獻就是被邀到各地主持聚會而已。他們的高齡，及被塑造成認信者 (confessors) 的象徵，對在海外才信主的一群（他們對中國

[16] 筆者剛發表了一篇探討家庭教會公開登記問題的文章，參梁家麟：〈有關家庭教會獨立登記問題的探研〉，《建道學刊》第 24 期（2005 年 7 月）。

教會所知不多），或許仍有精神上的黏合作用，但他們不是家庭教會的代表人物。

改革開放無疑助長了中國教會的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教會也面臨許多新問題和新挑戰，例如世俗主義已取代唯物主義，成為基督信仰的頭號敵人。在城市，改善經濟的壓力和誘惑，急速的生活節奏，五光十色的娛樂活動，人口的流動和關係的疏離，為牧養工作帶來不同程度的困難；陳腔濫調的政治八股或宗教說教，邊緣化的信仰陳述和屬靈思想（筆者常言的「難民神學」），已難吸引年輕人和專業人士。別說外展佈道，如何留住主動前來教堂的人，也是急待斟酌處理的課題。教會必須更新其牧養觀念和形式，深化信仰內涵和擴闊其生活應用的幅度；各個領域的應用神學(applied theology，包括倫理學、護教學、宣教學、崇拜學、靈修神學)都是待墾荒的蕪園，倫理問題尤其是嚴重的信仰考驗。

農村方面，城市化與世俗化的巨流對教會造成相當影響。大量年輕人棄耕離鄉，到城市尋找就業和致富的機會，造成農村教會年輕信徒嚴重流失，鄉鎮企業與娛樂活動也吸收了部分青壯信徒的時間和精力；冗長而頻密的聚會形式，再難吸引老年離休人士以外的其他信眾。傳統民間宗教與社區集體宗教活動的復興，也成了基督教發展的競爭者。在教會內部，以個人魅力和靈異經驗為主導的信仰形態，無法抑制挑戰者的繼起與不斷的裂教行動，外來勢力的招攬串連亦造成教會更大的混亂。

經濟改革為中國教會帶來極大衝擊，未來的政治改革肯定造成更大的挑戰。不過，中國教會雖然面對許多政治課題，她在未來最大的考驗卻仍不在政治課題之上，而在於社會課題之上。教會如何適應社會變遷，滿足社會需要，在其中確定福音的立足點與牧養任務，才是真正要緊的。有說家庭問題是未來教會必須回應的課題，教會事工的模式必須以此為中心。無論如何，教會與政府對立固然危險，被人民唾棄更屬致命。基督教在形式與信息上的「現代化」速度是否夠快？能否跟上時代的步伐和信徒的需要？這都是我們須要深思的課題。

四、福音的需要

在過去半個世紀裡，上帝施行了一個偉大的神蹟，使這個一度宣稱為徹底無神論的國家、一個據稱已將基督教連根拔起的共產國家，竟然成為亞洲擁有最多基督徒的國家。[17] 不管我們估計中國更正教徒的總人數是三千萬、五千萬、七千萬，抑或一億，相對於 1949 年以前，都是令人振奮的數字。事實上，要是國內基督徒的人數達到五千萬以上（這是我個人的估計），便已較台灣2.4%的基督徒比例為高。中國教會崛興於苦難之中，在這塊無神論的土地上，上帝保守了一群堅貞地為祂作見證的信徒，祂的大能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

當然，在這個樂觀的現象背後，我們仍得正視冰冷的數字。中國是全亞洲以至全球最多未信主的人的國家。據 1997 年統計，尚未福音化人口數最多的國家中，中國穩佔首位，其次為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日本和孟加拉。中國的福音需要仍然巨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以下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複合的現況：中國是全球最多未信者的國家；中國擁有一個全亞洲最大為數約五千萬的信徒群體。中國至今尚不是一個容許宣教士自由進出和傳教的地區；但是，許多中國人不是沒有聽過福音，而是沒有興趣聽，或聽了卻不感興趣，[18] 他們絕大多數不是沒有信仰而等待信仰（「三信危機」僅出現在少數知識分子中間），而是已有傳統信仰。所以對他們而言，接受新宗教不是填補信仰空隙，而是一個拆毀和建立信仰系統的龐大工程。我們的異象建造在上述的現況之上。

---

[17] 這裡單計更正教徒，若將天主教徒也計算在內，則亞洲最多基督徒的國家是菲律賓。詹金斯 (Philip Jenkins) 著，梁永安譯：《下一個基督王國》（台北：土緒出版社，2003），頁 143。

[18] 全國現有三自教會已登記的堂點約五萬個，非正式或未獲登記的約十萬個，連同為數更多的非三自教會堂點，大概有四十萬。

當然，我們最基本的信念是：中國需要基督的福音；不僅個別中國人需要基督的拯救，中國社會和文化也需要基督信仰的補正和更新。

回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走過的路，她是在先天缺乏、後天失調，內部問題深重、外在環境不友善的情況下，跌跌撞撞地發展到現在。中國背負著沈重的歷史包袱，也承擔著沈重的現實擔子。溫家寶總理出訪外國，提到一個深刻的體會是中國人受尊重了。對於背負自鴉片戰爭迄今百多年侵略與反侵略的歷史的中國人而言，受尊重是得來不易的事。[19] 不過，在充分理解國人雪恥競存的憂患意識之時，也得指出，未來中國的領導與百姓都必須突破專注求富求強、只爭朝夕的心理框框，尋求全面、均衡、可持續的社會發展；並以平和虛懷的態度，接受與其有異的外來思想與生活形態，不再咄咄逼人，不再戰意濃郁。中國政府把「和平崛起」的說法改成「和平發展」，正是朝這樣的方向前進。[20]

中國若要由建設民族國家逐漸轉變為建設文明國家，則上世紀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已不足以涵蓋其追求和關懷。我們關心的不僅是吃飽穿暖，而是生活的素質；我們關心的不復是其他國家是否輕賤我們，而是他們對我們有怎樣的印象和形象。

中國需要與物質文明同步的精神文明建設，需要能指導國人競逐財富的道德和價值觀，需要能塑造現代心靈的靈性。我們相信在這幾方面，基督信仰能對傳統的儒家和當代的馬克思主義作重要的補充和超越。國內不少非基督徒知識分子，亦在這個課題上做了許多論證。

---

[19] 王紹光：〈和平崛起與國家良治〉，21 世紀經濟報道編：《中國世紀——新的開始和機遇》，頁 8。

[20] 阿靜：〈在和平中崛起〉，<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81/13950/1245281.html>（2005 年 10 月 26 日下載）。

在我仍然年輕的時代，許多人主張要為中國創建一個基督教的心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我們期望除了基督的福音能拯救個別的中國人外，基督教信仰亦能幫助中國人建立一個持平的、均衡的、人道的、能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藉以取代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今天海外基督徒就這方面的探索和討論減少了，惟國內不少基督徒知識分子仍朝這個方向努力。

中國社會未來是否需要一個指導性的思想，又基督教是否能提供這樣的指導思想，有待進一步商榷；不過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確實需要一套最多人認受的價值觀，作為社會的共識與國人行為的規範。

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 (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曾說：極權主義可以不需要信仰，自由卻不能。我們也可以補充說：西化的社會不用信仰，現代化的社會不能不要。沒有一個道德和價值的超越基礎，沒有一個能與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相抗衡的絕對價值，我們難以建立對個人和社會有效的規範。

五、海外福音事工的挑戰

最後，我們略談一下海外（包括香港、澳門所謂的「境外」）的中國福音事工。

海外教會參與中國事工已累積數十年的經驗，對中國的國情、機遇和禁忌已有相當認識，也曉得如何與政府和民間團體交往，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各取所需，尋求雙贏，這些都不用多說。中國的需要龐大，教會多元化，因此中國事工多元化也是應該有的。不同的堂會與機構各有不同的政策和服事對象，彼此無須達致共識或訂定共同的事工策略；只要不是互相批評，抵銷對方的貢獻，而是各自致力圓現其信念和目標，便已是最佳搭配。畢竟引領中國教會發展的導演是上帝。

這裡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海外教會必須學習擺脫中國政府與三自教會所強加於我們身上不公平的歷史指控，溫和而勇毅地提出我們對政府宗教政策、基督教發展的種種建議，期望她們朝更健康的路向改革。中共立國已逾半個世紀，基督教重開亦超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歷史的所謂「欠債」難再支持不合理現狀的合理性；而教會亦不能滿足於僅僅存在，必須問因何而活，往前看而非往後看。筆者特別期望海外的基督徒政治家、商人與學者，能藉不同管道向中國政府建言。

第二，海外教會必須防範將中國事工激化的種種危險行徑。由於中國事工機構數目繁多，不少原在某機構服事的人在離職後自組新機構，山頭處處，競爭激烈。部分機構為了爭取曝光率與奉獻資源，不顧一切的推動大型活動與運動，刻意製造神話故事，甚或製造事故挑釁中國政府。加上以各種途徑移居海外的原國內牧者或信徒愈來愈多，他們不少亦以投身中國事工作為生活之資，並動輒宣稱擁有與國內信徒的聯繫渠道甚或國內教會的代表性，「假、大、空」的現象頻仍。數年前喧囂一片的「歸回耶路撒冷運動」是其中一個典型事例；最近某美國機構推動在香港主辦一個大型的福音會議，倡言邀請五千至一萬個家庭教會成員來港參加。[21] 中國人總是愛喊口號的民族，骨子裡都信奉「唯意志力論」。「文革」時期提出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其基督教版本在若干奮興運動家與靈恩佈道家口中常有聽聞。筆者所關切的還不是海外信徒的受騙，而是國內信徒無辜受連累。

套用前面的話，今天是我們對中國福音事工最不應該悲觀的時候。我們看到上帝的作為，我們期盼祂有更大的作為。

---

[21] 倡辦是次會議的負責人曾跟筆者談過他們的抱負。他們宣稱高姿態地主辦一次超大規模的會議，目的是要催促國內家庭教會的信徒走上地面，拒絕給邊緣化的政治地位，在社會上發揮更大的光與鹽作用。筆者對於這個終極的目標甚表佩服，卻懷疑這個目標能否藉一次喊口號的大型會議而實現。較令筆者困惑的是，就我有限所知，倡辦者與他們所主辦的雜誌，壓倒性是生命派的神學話語，幾乎不曾談過信徒的社會關懷和文化責任；這樣的神學取態只能鞏固家庭教會的社會邊緣化，如何能改變有關現實呢？